

比较译丛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英] 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余江◎译

全球化 为什么可行

F114.41/8

2008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英] 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余江◎译

全球化 为什么可行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英) 沃尔夫著; 余江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6

书名原文: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ISBN 978-7-5086-1223-2

I. 全… II. ①沃…②余… III. 经济一体化—研究 IV. F11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311 号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by Martin Wolf

Copyright © 2004 by Martin Wolf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QUANQIUHUA WEISHENME KEXING

著 者: [英] 马丁·沃尔夫

译 者: 余 江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41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1112

书 号: ISBN 978-7-5086-1223-2/F · 137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4264377

author@citicpub.com

耶鲁·诺塔·比恩版序

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一段时间，关于全球化的热烈讨论似乎快要完全消失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成了世界政治的焦点。然而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有关服务业外包的讨论又把全球化议题重新带入政治议程。一些极端组织的杀戮让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们暂时陷入了沉默，不过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仍然在疲于应付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冲击。

我们愈益清晰地看到，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事件。这两个国家拥有全球近40%的人口，是今天的全部发达国家的2.5倍，它们的成功变革对于人类抵抗恐怖主义的长期斗争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因此，全球化的议题依旧重要。经济一体化不但会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决定着国家之间力量的消长。

读者们对于本书的反响令我感到鼓舞和刺激，也提示我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领域。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在2004年6月发表的肯定性的书评中就提出，我没有给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还有，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颇有思想性的评论中也提醒说，反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在主流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可惜任何一本书，包括我自己这本力图做到全面的在内，都无法覆盖所有相关的主题。总的来说，我对于本书的内容取舍并不感到特别遗憾，不过有如下三点例外。假如我能够更多地注意到由于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服务业贸易（或者外包）的增加，效果或许会更好。假如我把更多的篇幅留给对现存国际货币体系（或者说还不成体系）的正反双方意见的讨论，或许更为明智。我也许还应该更多地强调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因为这项任务十分紧要。

不过，本书已非常接近我能够对全球化议题发表的最好的陈述了。经济活动通过市场跨越国境的束缚（即我所说的全球化），乃是当今时代发生的伟大事件，

这一点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全球化给数亿人民带来了福利，帮助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比例的减贫。未来的挑战是如何把全球化的机遇更多地普及下去，它要求我们对政府和政策都进行改进，这是整个世界最需要优先处理的议程。

马丁·沃尔夫

2004 年 12 月，于伦敦

序 这本书的由来

自由贸易是政府能够给人们带来的最好的政策之一，却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不受欢迎。

托马斯·麦考利 (Thomas Macaulay), 1824 年¹

思想至关重要。这恐怕是我从自己的父亲、已故的埃德蒙·沃尔夫 (Edmund Wolf) 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老沃尔夫是奥地利犹太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希特勒的兴起到英国避难。他是一位剧作家、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是他告诉我，那些疯狂的纳粹思想和同样疯狂的其他意识形态如何曾经摧毁并在如何继续摧毁文明世界的美好生活。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 1946 年，纳粹德国在一年前才被彻底打败，思想带来的危险对我来说并不遥远。自我接触外面的世界伊始，思想的威力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我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被武装起来的思想所驱逐的难民，我了解到尽管父亲和母亲各自的家人都成功逃离了欧洲大陆，他们的绝大部分亲属却都毁于今天人们熟知的大屠杀——我更多地想到的是希伯来语中的 Shoah（意思是浩劫）。来自荷兰犹太人家庭的母亲苦涩地告诉我，她有差不多 30 位叔伯阿姨和表亲都被纳粹杀害。而我本人也从小就意识到，另一种恐怖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欧洲的分裂，并时刻威胁到自己所居住的那个岛国的自由与安宁。

作为一名诚实的人和作家，我父亲对人物的思考和刻画不是属于“他们应该怎么样”，而是要表现“他们实际怎么样”。因此，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从来没有被共产主义吸引过。他一直都在支持民主、反对极权主义的立场。然而与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阶层一样，他也倾向于社会主义，当然是指较为温和、谨慎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便成为他自然的精神归属。我不知道他会如

何评价托尼·布莱尔这个人，但他应该会欣赏布莱尔的政策。我父亲长期从事记者、播音员和作家的职业，他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BBC公司德语节目的编导，在60~80年代先后担任著名的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驻伦敦记者和专栏作家、纪录片制片人，以及几部曾经获奖的德国电视剧的编剧。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强调自由民主体制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却钟情于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父亲对我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无论在知识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如此。同样重要的是，我从自己的母亲那里也学会了坚守人的尊严。我后来逐渐向古典自由主义者靠拢（也就是本书中所谓的“自由主义”），而远离了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自由主义，但我从未背弃双亲的基本价值观²。我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民主政府对真理的无私追求是多么珍贵而又多么脆弱。我还发现，这些价值观有着许许多多公开和隐蔽的敌人，其中最坏的是那些享受着自由民主社会提供的宽容却在尽一切可能破坏这种体制的知识分子。我后来了解到，他们也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所抨击过的同一类型的人，他们在每个时代都会卷土重来，把流毒泼向天真的年轻人。20世纪60年代最有煽动性的鼓吹手可能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最近以来恐怕要数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65年10月，我前往牛津大学的考帕斯·克里斯蒂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研读古典文学，刚好是在席卷我那一代人的大规模抗议浪潮爆发之前。其中某些抗议活动，特别是反对越南战争的部分，在当时和今天看来都是正义的。我当时也认同那些主张个性解放的要求，不过如今却感觉，它与很多革命一样功过难断。还有很多幼稚的左派抗议活动则是我有所预防的。我当时遇到过很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他们似乎认为彼此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有人向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问起两位不知名的诗人各自的特长何在时，他的回答是：在虱子和跳蚤之间没有优劣可言。我那时已经察觉到，他们对于自由民主制度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共有的敌视，让我感到可鄙。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训，正在为后来的历史一再证实。

幸运的是，我在牛津大学也发现了为更积极的事物，特别是在1967年转向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专业之后。我当时学到的一门与本书主题有关的很重要的课程是，分析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体系的崩溃，这种体系在那段时期遭到了各类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最后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我还从中了解到，良好的经济政策可以

维护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抵抗其对手的攻击——当然，在那时的牛津大学的许多经济学家眼中，所谓良好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稍加改进的凯恩斯主义而已。而如如果爆发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都会受到威胁。保持繁荣固然需要，然而这并非经济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经济发展对于文明的延续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一旦人们被剥夺了改善自己和子女的生活状态的希望，全社会的基础共识就将被动摇。

我刚到牛津大学的时候，由于父亲的熏陶，还是一名秉承当时刚过世的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 16 岁开始，我就是工党青年部里坚定而活跃分子。在牛津期间，我加入了工党活动中心，但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参与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牛津大学民主工党活动中心——因为反对当时的哈罗德·威尔逊政府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原有的工党活动中心。民主工党活动中心于 1966 年初成立，到 1967 年我当选主席。直到 70 年代早期，我一直都是工党的热心支持者。

1969 年我进入牛津大学的纳菲尔德学院，攻读今天所称的经济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我在那里认识到了国际贸易对于经济繁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进步的重要作用，主要受益于三位老师：伊恩·利特（Ian Little）、莫里斯·斯科特（Maurice Scott）和马科斯·科登（Max Corden）。马科斯·科登当时已经完成了关于保护政策的效果的重要研究，他讲授的贸易理论课程对于像我这样数学不好的人尤其有价值³。另外两位老师和耶鲁大学的提波·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 1970 年发表了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发展著作之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贸易》（*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那部杰作是现代的《国富论》，它总结了利特教授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组织的有关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跨国研究项目的成果⁴。那本书也是一篇反对激进革命潮流的宣言，它鼓励发展外向型贸易经济，反对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宣扬市场经济，贬低干预主义。这样的观点在后来变成了主流，但在当时却是对造成了极大破坏的权威理论的挑战。

那本书也坚定了我对于市场经济超出其他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的信仰。借用温斯顿·丘吉尔有关民主制度的妙语，可以说，市场经济或许是个极其糟糕的经济体制，但却是我们已经尝试过的经济体制中最好的。信仰的转变还源于我当时为撰写英国住房政策的论文而进行的研究，我从其中看到了租金管制和简易（公共）住房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那时也在纳菲尔德学院、后来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说服我，就这个题目为青年费边人组织（Young Fabians）撰写一本小册子。一位陌生的读者曾经对那本小册子表现出了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我后来才

知道他是前内阁成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这些事情让我明白，工党在精神上已是穷途末路，即将为过气、破败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殉葬。我没能说服比克罗斯曼聪明得多的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要对弊端重重的住房政策进行激进改革，更是加深了自己对工党的失望。

随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特别是《通向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让我更加坚信，市场经济乃是稳定和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市场或许不是充分条件，但必不可少，因为计划经济内在的权力集中与基层的监督要求是不可调和的。市场还能让人们表达自己的经济选择，这也是自由的组成部分。

这些思考让我从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我今天仍然是古典派的自由主义者，这不但是因为我对于个人自由的无上价值的信仰，还源自我对政府干预的能力和智力的怀疑。当然，我如今认为自己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美国人所说的自由主义者）的差别其实很小。这部分是由于苏联东欧体制的崩溃打消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对于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幻想。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中间派保守主义者而今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迎接宗教狂热分子、蒙昧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反全球化主义者的攻击。本书就是为所有这些派别的人士所写，我希望他们能够从中认识到全球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发展是多么宝贵。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承认或拒绝这个事实，而是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进行规范和管理。

在纳菲尔德学院的最后一个学年，我向世界银行申请专业研究职位。当时的世界银行经济部门负责人大卫·亨德森对我的这个决定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有意思的是，他很快和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产生了意见冲突，离职后返回了英国。亨德森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我遇到的另外一位自由主义斗士则是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当时是纳菲尔德学院的教师。

我自1971年开始了在世界银行的职业生涯，在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普里斯（Stanley Please）领导的部门工作。我认为那是个很有意思、很有回报的工作机会，而且我当时相信（今天依然），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提高穷国的收入水平是当代最大的挑战。世界银行的工作给了我极好的训练，并带给我许多毕生的朋友，其中许多人后来在自己的祖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最早的同事中包括蒙特克·辛格·阿鲁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后来推动经济改革的印度财政秘书，还有桑卡·阿卡亚（Shankar Acharya）——后来出任印度首席经济顾问，他们二人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市场导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在1972~1974年担任世界银行东部非洲地区的经济学家，在1974~1977年担任印度地区的经济学家，通过这段时期亲眼目睹了干预主义、内向型经济政策带来的破坏。那些国家的弊病不止是来自各种管制措施导致的效率低下，更有它们诱发的腐败泛滥。为世界银行服务的10年中，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对外贸易来促进增长。

我为世界银行撰写的第一份重要报告是关于肯尼亚的私人经济部门的发展，之后我又开始研究赞比亚政府的政策对农业的不利影响。这两个国家的情况都让我非常沮丧，因为它们采取的经济政策很危险，而世界银行却或多或少给予了支持。不过我最多的精力还是花在研究印度的大量干预主义和限制外贸的政策上面，世界银行当然也为印度提供了资助，只不过由于该国规模太大而显得微不足道而已。我一直不能忘记印度的许可证制度造成的可怕后果，对于每家企业要生产什么，要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和投入，这个制度都有详细的规定。我的研究逐渐积累成了一本关于印度出口产业部门的图书⁵。在印度工作期间，我有机会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曼莫汉·辛格，当时的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和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动经济改革的财政部长。

我在世界银行从事的工作还包括，作为团队成员参与了1978年发表的第一份《世界发展报告》的写作，历时一年。这是当时担任行长职位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最有想象力的行动之一，项目负责人是厄尼斯特·斯特恩（Ernest Stern），他那时已经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运营负责人，后来在那个位置上工作了近20年。我个人的研究重点依然是对外贸易领域。我在世界银行的工作受到了已故的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的重要影响，他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世界银行服务，不遗余力地为外向型贸易政策奔走呼吁⁶。另外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界人士包括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如今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的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等。这两位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过有关外贸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经典研究文献⁷。

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认识到尽管世界银行有着非常友善和能干的职员，它在机构上却有着致命的缺陷。世界银行的失败的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它的任务是提供贷款，但是几乎从不考虑借款国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由于这个机构很少承认自己提供的资金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果，因此缺陷也难以弥补。该缺陷由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个性特点而被进一步放大，这位前美国国防部长从1967年到1981年一直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麦克纳马拉是个性情暴烈、充满消

灭贫困的激情却极度缺乏常识的人。从本能上说，他是个计划制订者和数量标准专家。在首席经济顾问、已故的霍利斯·切纳里（Hollis Chenery）的支持下，他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随着投资和外汇的增加，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加快；而投资和外汇的增加都要求更多的资金流入；于是，世界银行可以提供很大一部分资金，启动穷国的增长。在他的任期内，世界银行的规模和贷款都大幅度扩张。每个分支机构都发现贷款的压力在迅速增大，却无力关注资助项目的质量以及受援国的发展计划。这种盲目扩大贷款的压力损害了世界银行职员们的职业态度，纵容受援国的债务大量增加，而无视未来的回报前景。这显然是不能持久的——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蒙特克·阿鲁瓦利亚曾告诉我，世界银行当时正在一个没落产业中扩大规模。扩张的极限很快就到来了，随着麦克纳马拉离职，这种模式也很快结束⁸。

那时我已经感到受够了。我在印度担任高级地区经济学家已有3年的时间，主要的任务乃是为世界银行论证给印度提供大笔援助的正当性，可是，这些钱却让印度政府可以有余力继续抵制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其结果是，在浪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后，随着1991年爆发的严重的外汇危机，许多改革才真正启动。改革的掌舵者是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当时的经济秘书、后来改任财政秘书蒙特克·阿鲁瓦利亚也给予了积极协助。印度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了三方面的教训：政策的改变对于经济的发展能产生明显的作用；通过少数明智、积极和严格自律的个人的努力，这样的政策改变是可能实现的；最重要的是，这些改变不可能被外界强加。

不幸的是，滥发贷款并非世界银行唯一的错误，另外一项错误是这些贷款都必须贷给政府。这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切实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其次，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本来就不合理的对于所谓国家利益的集体主义态度。结果导致，来自世界银行的贷款让那些腐败不堪的政府更容易无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即将离开世界银行的时候，我得到的结论是，受援国基本上分为三类：不需要援助的国家、不愿意利用援助的国家以及既需要又愿意利用援助的国家。第三类国家的数量很少，而世界银行根据规程又不可能专门为它们服务，结果就使得世界银行的努力经常是不必要的、浪费的。所以，对于已故的彼得·鲍尔（Peter Bauer）爵士很早以来对于国际援助的批评，我基本上都持同意的态度⁹。

尽管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实现成功发展的要素之一，但负责协调全球经济的机构的运转却相当失败，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这样的看法。为自由世界经济秩序辩

护并不等于保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或者任何特定的机构。这些机构当然应该根据它们的实际价值而决定支持、改革或者摒弃。而在当年，这样的看法促使我脱离世界银行，加入更为不确定的智库产业。1981年9月，我来到伦敦的贸易政策研究中心担任研究主管，已故的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大师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曾一度担任过这个职位。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在充满活力的主任休·科伯特（Hugh Corbet）的领导下，在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研究领域赢得了杰出的声誉。我在世界银行的最后两年与他们就有过接触。我与同事多纳德·基辛（Donald Keesing）一起撰写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课题的报告¹⁰。这个研究深刻地暴露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对待穷国的比较优势方面的伪善，而且反映了某些贸易政策体制极其缺乏理性的特点。

我在贸易政策研究中心担任研究主管有6年的时间，其间的大多数研究项目都是针对启动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就是最终在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我们中心在制定服务业贸易谈判议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我本人最重要的贡献却是有关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体制中的作用的课题。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不愿意在互惠基础上进行协商，而是坚持要享受“特殊和不同待遇”，我们的研究对于这种态度提出了质疑。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已故的罗伯特·哈德克（Robert E. Hudec），他当时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知名的国际贸易法专家¹¹。

可叹的是，智库的财务状况从长期来看是很脆弱的，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到1986年，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前景已经变得相当黯淡，不久之后也的确就关门大吉。当我在寻找新工作期间，《金融时报》当时的编辑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在1987年突然邀请我担任首席经济社论作家。这可是他的一次豪赌。尽管我曾经为报纸写过几篇文章，但从来没有，也不曾想到过要扮演新闻记者的角色。这是一次难以抗拒的挑战，于是我在1987年9月加盟了《金融时报》。

那段时间，有关经济政策的传统思维已经经历了多次革命的洗礼。通过微调来实现真实产出目标的天真的凯恩斯主义信条被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撕碎，取而代之的是寻求货币稳定，各国普遍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控制体制——我是在70年代从莫里斯·斯科特那里首次听说的。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到处失宠。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抛弃了外汇管制，在80年代初启动了私有化运动，并且波及全球。80年代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发明的名词——强调良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依靠市场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我来说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看到各国纷纷认识到内向型贸易政策的失败和贸易自由化的优点。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发展中国家在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发挥了比前几轮谈判更大的影响力，最终是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在 1995 年 1 月的创立。

这样看来，在长期的集体主义风潮过后，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思想又得到了重生¹²。苏联集团在 1989 ~ 1991 年的崩溃进一步肯定了世界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革方向——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惊喜。奉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模式已经死去。美国观察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虽然这个观点受到了某些人的攻击，但福山所要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实践证明，自由民主政体是唯一能维持发达经济和社会运转的社会制度。他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自由主义的敌人仍然在制造各种威胁，企图终结历史学家们肯定要赞美的我们今天的“黄金时代”。而且这也不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屡见不鲜的闹剧和罪行将从此消失，它们在未来的世纪中还将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如果处理得不好，还会把世界重新拖入混乱无序的泥潭。假如要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我们需要选择，是选择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还是一个更糟糕的未来。

本书并不是为学术目的写作的，而是为了说服。首先我要阐述的道理是，一个由统一市场连接起来的世界将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好处。市场是人类发明的最有效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机制，没有其他制度可以匹敌。然而市场需要政府的支持，一如政府离不开市场的繁荣。如果这二者能很好地结合，形成现代化的自由民主社会，那无疑是社会管理的最好的模式。这样的体制需要更广泛地得到普及。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全球化太多，而是太少。如果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和更多的全球性的政府间合作，未来无疑会变得更好。我并不是主张代替现有的主权政府，那是毫无意义的、破坏性的建议。但我希望各国政府能更多地理解在全球经济秩序领域的合作对于各自的长期利益的好处。对于这些命题的论述将是本书的核心。

人类第一次全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失败导致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浩劫，让我父母那一代人饱受创伤，数十亿人的生活受到了这些错误的影响。今天的全体（或者说接近全体）人们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些破坏自由秩序信仰的思想是错误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良好运转，极端意识形态和法西斯主义非但是错误，而且是犯罪。帝国主义是死路一条。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更是摧毁过欧洲的文明财富。如今的我们重新建立了一个更为美好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它会向全世界的人们打开机遇的大门。这个成就既是来自幸运，也要归功于自己的选择。不要再次抛弃这个黄金机会，乃是我们对于后人的责任。

目 录

耶鲁·诺塔·比恩版序 / IX

序 这本书的由来 / XI

第一篇 讨论

第一章 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 / 3

反全球化运动简介 / 4

反全球化运动提出的抱怨 / 7

大规模恐怖主义横空出世 / 8

本书的主要观点 / 9

第二章 什么是自由主义全球化 / 11

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定义 / 12

对技术决定论的反驳 / 14

全球化的更多方面 / 15

结 论 / 16

第二篇 为什么需要全球化的市场经济

第三章 市场、民主与和平 / 19

自由和繁荣 / 19

建立公益性的仁慈政府 / 21

自由民主政体引导的国际关系 / 27

集体主义势力对于自由秩序的挑战 / 29

前方的挑战 / 31

第四章 市场的魔力 / 33

市场经济的兴起 / 33

市场经济在过去一千年的成长 / 35

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 37

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 / 40

有关市场经济的道德思考 / 44

市场是重要的 / 47

第五章 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 / 49

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中央计划经济的终结 / 49

政府需要为经济做的事情 / 51

让政府的干预更有效率 / 54

政府为什么会失灵 / 56

如何改革政府 / 62

结论——找到谦卑的公仆 / 64

第六章 市场跨越国境 / 65

一体化的经济逻辑 / 67

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学——单边自由主义和国际自由主义 / 75

第三篇 全球化为何如此有限

第七章 从长期看全球化 / 81

全球一体化的逻辑 / 81

从长时期看全球化 / 83

第八章 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兴起、衰落和复兴 / 89

19~20 世纪的经济增长和一体化 / 90

19~20 世纪的世界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 91

技术变革 / 100

政治和政策 / 102

评 价 / 112

第四篇 批评者们错在哪里

第九章 不平等带来的愤怒 / 115

经济增长与全球化 / 117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 124

增长和贫困 / 131

贫困与人类福利 / 138

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 140

结 论 / 144

第十章 外贸带来的伤害 / 145

对廉价劳动力的恐惧和去工业化的误区 / 146

对于生产能力过剩的担忧 / 153

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遭到剥削所引发的担心 / 154

对环境的威胁 / 157

“本地化主义”的荒唐 / 162

对于自身发展战略的忧虑 / 166

初级商品出口国面临的陷阱 / 170

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威胁和机遇 / 172

富国的伪善 / 176

结 论 / 181

第十一章 被公司恐吓 / 183

公司比国家强大吗 / 184

品牌的“暴政” / 188

跨国公司对贫困国家和工人的剥削 / 191

公司的海外投资剥夺了母国的工人 / 202

公司控制了政治生活 / 203

结 论 / 206

第十二章 政府的沮丧 / 207

对于全球化的选择 / 208

税收和监管 / 209

关于赤字财政 / 226

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 / 228

限制政府行为的好处 / 228

全球化不会消除政府存在的必要性 / 229

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 230

第十三章 对金融的恐惧 / 231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争议 / 234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议 / 239

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政策改革 / 244

结 论 / 251

第五篇 怎样让世界更加美好

第十四章 今天的威胁，明天的希望 / 255

全球化面临的威胁 / 256

重大的两难问题 / 260

批评者给我们提供的教训 / 263

全球性的挑战 / 264

注 释 / 266

参考文献 / 303

致 谢 / 321